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 文化学考察

(上卷)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Academic Library

Wuhan University

尚永亮等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项目成果
「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之子课题成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验收之优秀等级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

(上卷)

①武 ②汉 ③大 ④学 ⑤学 ⑥术 ⑦丛 ⑧书

Academic Library

Wuhan University

尚永亮
刘永亮
洪迎丹
李洪丹
著

目 录

导论 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研究进路·····	1
一、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路及其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1
二、元和诗歌在诗史上的重要性及其整体特征·····	4
三、元和诗人群的诗派特点与相关辨析·····	11
四、元和诗歌的研究现状与基本构想·····	15

第一编 中晚唐五代时期

第一章 韩孟诗派在中晚唐的传播与接受·····	25
第一节 概述·····	26
第二节 韩孟诗派的形成和自我接受·····	31
一、以韩愈、孟郊为中心之交游群体之形成·····	32
二、韩孟诗派的自我接受·····	36
第三节 元和诗坛的横向比较·····	38
一、韩孟诗派与“元和体”之关系·····	39
二、张籍的意义·····	41

三、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与韩孟诗派	44
第四节 杜牧、李商隐与韩孟诗派	46
一、杜、李对韩愈诗歌之接受	47
二、杜、李在李贺诗歌接受中的重要意义	48
第五节 对贾岛的接受及其社会文化原因	53
一、接受贾岛的诗人群体与接受内容	53
二、“贾岛现象”的社会文化原因	57
 第二章 元白诗派在中晚唐的传播与接受	61
第一节 概述	62
第二节 “元和体”诗传播接受状况之考察	70
一、“元和体”诸说之渊源及其辨析	70
二、“元和体”原初内涵之确认	77
三、“元和体”之传播时间、地域及受众层次、态度的 变化	88
第三节 中晚唐诗人对元白诗的褒扬和批评	98
一、始于中唐的肯定和褒扬	98
二、杜牧等晚唐诗人对元白诗风的不满和批评	101
第四节 唱和诗与讽喻诗在晚唐五代的反响	107
一、对“元和体”的效法	107
二、怨刺精神的展现	109
第五节 元白诗派通俗诗风在五代的流变	113
 第三章 刘柳诗歌在中晚唐的传播与接受	118
第一节 概述	119
第二节 政治行为和文学才能毁誉参半	121
第三节 柳宗元诗歌当世传播效应分析	125
一、酬赠诗和独白诗——柳诗创作的两种类型	126
二、生存状态对柳诗传播的直接影响	131
三、立名思想对柳诗传播的限制	135
第四节 刘禹锡诗歌的民间传播	140

第五节 晚唐名家对刘诗在接受	146
一、杜牧与刘禹锡	147
二、李商隐与刘禹锡	156
三、温庭筠与刘禹锡	163
第四章 元和诗人别集的整理与传播	170
第一节 韩孟诗派别集的整理与传播	171
一、韩愈集、孟郊集	171
二、李贺集、贾岛集	174
第二节 元白诗派别集的整理与传播	176
一、白居易集	176
二、元稹集、张籍集、王建集	184
第三节 柳宗元、刘禹锡别集的整理与传播	189
一、柳宗元集	189
二、刘禹锡集	190

第二编 两宋时期

第五章 韩孟诗派在两宋的传播与接受	197
第一节 概述	198
第二节 欧阳修、梅尧臣对韩孟的群体接受	215
一、个体接受和群体接受：意义重心的偏移	216
二、群体接受的几种形式：推名、唱和、联句、拟作	221
三、群体接受的内容与效应	228
四、群体接受的文化背景与深层原因	235
第三节 王安石、王令对韩孟诗派接受之异同	241
一、矛盾表象下的暗中袭承	242
二、旗帜鲜明的倾心摹仿	244
三、二王交谊及其接受韩诗之差异	248
第四节 苏轼对韩孟诗派的权威评价	252
一、“诗格之变，自退之始”	253

二、“郊寒岛瘦”	258
第五节 两宋之交的分化趋向与多层面接受	261
一、黄庭坚的理论贡献与创作实绩	262
二、陈师道的“身作贾孟行诗图”	267
三、由“以文为诗”之争反映的诗坛动向	270
第六节 南宋后期对贾岛、李贺的接受	275
一、永嘉四灵的崇贾之风	275
二、江湖派诗人的接受态度	278
三、谢翱等遗民诗人对韩孟诗派的接受	280
 第六章 元白诗派在两宋的传播与接受	284
第一节 概述	284
第二节 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仿效	288
一、宋初游乐与崇白之风	289
二、宋初学白的代表诗人	291
三、晁迥与释智圆之崇白	294
第三节 王禹偁与白居易	298
一、王、白诗歌之关联	298
二、对唱和诗的热衷	301
三、讽喻诗创作及其他	303
第四节 欧、梅对元白诗派的接受	307
一、对白居易的基本态度	308
二、讽喻精神与平淡特色	311
第五节 苏轼之“慕白”及其对白居易的超越	313
一、“出处依稀似乐天”	314
二、苏与白之差异及其对白的超越	320
三、苏轼等北宋诗人对白诗的仿效	327
第六节 “白俗”论及其在两宋的流变	339
一、“白俗”论辨析	339
二、“白俗”论影响下的北宋批评	341
三、南宋人如何看“白俗”	346

四、“白俗”论产生的思想文化原因	354
第七节 宋代评论视野中的元白诗派	357
一、道德评判与元稹接受	357
二、元白长篇及其优劣评说	361
三、对张王乐府的评价	365
四、对元白诗派之认定及其接受史的探寻	370
第七章 刘柳诗歌在两宋的传播与接受	373
第一节 概述	374
第二节 对刘柳政治作为的两种态度	376
一、否定态度之转变：以范仲淹、王安石为代表	377
二、否定态度的继承和变化：以《新唐书》、司马光和 苏轼为中心	381
三、南宋人的延续和发展	389
第三节 欧、梅、王与刘柳诗歌	392
第四节 苏轼对柳宗元诗歌的诗学批评和创作接受	397
一、以陶、韦、柳同论的方式阐释柳诗风格	398
二、从柳诗接受主流看苏轼“第一读者”的地位和影响	403
三、从创作层面看苏轼对柳诗的接受	420
第五节 苏轼对刘禹锡的创作接受和理论发展	425
一、“刘郎”与“桃花”：苏、刘的讽刺诗	427
二、苏、刘诗句渊源关系之案例分析	434
三、“虚静”和“象外”：苏、刘创作理论之承接	444
第六节 江西诗派对刘禹锡诗的群体接受	448
一、对刘诗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448
二、对刘诗艺术的普遍喜爱和高度赞誉	453
三、以点化的方式借鉴刘诗	459
第七节 江西诗派与柳宗元诗歌	467
第八节 南宋诗话与刘柳诗歌	474
一、严羽《沧浪诗话》接受柳诗的贡献	475

二、刘克庄《后村诗话》对“诗豪”刘禹锡之解读	483
第八章 元和诗人别集的整理与传播	488
第一节 韩孟诗派别集的整理与传播	488
一、韩愈集、孟郊集	488
二、李贺集、贾岛集	492
第二节 元白诗派别集的整理与传播	494
一、白居易集、元稹集	494
二、张籍集、王建集	498
第三节 刘柳别集的整理和传播	501

导论

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研究 进路

一、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路及其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文学接受史研究建立在接受美学的基础上。德国学者 H. R. 姚斯 1967 年在康斯坦茨大学发表题为《文学史的方法及其研究目标是什么》的就职演说^①，标志着接受美学的正式建立。此后十多年间，接受美学逐渐传播全球，成为 20 世纪后期影响最大的文学理论流派之一。与传统文论对作者、作品的专注相比，接受美学首次从本体论高度提出了读者和阅读接受的问题，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重视阅读经验，向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发出了挑战。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它的接受历史也开始书写；每个历史时期的接受者都有对同一本文的不同发现和诠释，这构成了接受史链条

^① 这篇演说稿后来更名为《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1967），后又缩略为《作为挑战的文学史》（1970）正式发表。最早的中文译本由周宁、金元浦根据英文版论文集《走向接受美学》译出，收入《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一书。

中的不同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以对前代的接受为基础；文学作品因为接受者的不断解读——包括重读、深读，甚或误读，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文学的历史本质有赖于接受者的接受而得以体现，或者说，不同时期接受者的接受正是文学历史本质的表现。

接受美学告诉我们：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背景，由于多种多样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同一作家、作品在接受视野中形成了不尽相同的面目，这种面目是由不同读者塑造而成的。正如国内的译介者所言，接受美学的一大功绩是对读者的发现。此外，接受美学还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大部分的创作群体或个体，其创作的价值并不是在产生之时就全部显现出来的，有不少是在作者身后才被逐渐发现，甚至是被附加的，而这种发现和附加是一个过程——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也不应是孤立和静止的，更不能是断章取义、主观臆断的；而应该用动态的、历史的眼光去考察。由此，读者在文学史中的作用得以突显，一种由作者、作品、读者三方构成的动态文学史观得以形成。

重要作家是文学接受史关注的主要对象。美籍学者宇文所安有一段话说得好：“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是围绕着‘重要的’作家进行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问他们是什么时候成为‘重要作家’的，是什么人把他们视为‘重要作家’，根据的又是什么样的标准。”^① 这样一个本是研究者题中应有之义的问题，在传统文学史观的影响下，却常常被我们忽视。事实上，作家的历史地位与作品的艺术思想价值不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而被给定的客观存在，它只有通过社会传播和读者接受才能体现出来。所以，“重要作家”的名望并非在创作完成之后就立刻产生了，它还必须经过传播和接受两个环节的检验。由于传播接受境遇的不同，各个“重要作家”成

^① [美] 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 页。

名的时间效应也就不同。有的在当世就能赢得满天声誉，而有的在若干年后才会被突然发现。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某一时代的某一作者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时，理应具有这样一个清醒的历史性的认识：他的意义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后的读者赋予的。

我国对接受美学的译介、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后期，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小枫选编《接受美学译文集》（三联书店1989年版）、朱立元著《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译著、论著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接受美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接受美学的引入，为古典文学接受史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从另一角度看，我国传统文论中也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接受美学思想。虽然“我们古代没有‘接受美学’这个词，但其思想幼芽和资料则比比皆是”^①。仅就20世纪而言，在西方接受美学引入我国之前，即存在着许多以辨析源流影响、融会诠释品评等传统方法为主的文学接受研究，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对陶渊明、韩愈、李贺等人被接受情形的细致入微的考察，便是显例。^②承接先行者的余绪，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接受美学经典著作中译本的普及，许多学者受西方理论和本土实践的双重影响，开始自觉地将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接受美学结合起来，很多传统论题在转变观照视角后又显露出了巨大的探索空间。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从理论、方法层面对古典诗歌接受史的研究作了颇有价值的探索，并以多个经典作品、艺术原型为个案进行了接受史撰述的尝试。古典诗人的接受史，以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为滥觞。在此后的几年里，古典文学和著名诗人传播接受史的研究论著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诸如尚永亮的《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

① 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 参见尚永亮：《论钱钟书对韩愈李贺诗的艺术发微》，《中国诗学》第八辑；《从接受学角度看钱钟书的韩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 年版）、尚学锋等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李剑锋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研究》（齐鲁书社 2002 年版），都在各自的研究主题中有所斩获，并在整体上推动了古典诗文接受史研究的进展。此外，不少博士、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也聚焦于此。^① 较之传统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表述立场，传播接受史更加关注读者及其阅读接受经验的能动作用、再创造意义，从文学史原生态的层面把握文学作品的产生、流变过程，因而深化并细化了文学史的相关考察。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顶峰，诗人群星璀璨，经典诗作琳琅满目，影响深远。从传播接受史的角度看，唐诗经典意义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变化、历史的过程，唐诗的传播接受史不仅是唐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这类研究虽已涉及宋之问、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等若干著名诗人，但总体看来还缺乏系统性和深入度，选题范围既需要向其他诗人进一步拓展，也需要由个体向群体转变，尤其需要向重要时期的重要作家和重要群体转变，以期获得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的整体突破。出于这种考虑，我们选择中唐时期的元和诗人群，运用接受学、文化学、比较学、心理学和定量分析等方法，对其诗歌在后世传播接受之升沉起伏等不同情形予以系统考察，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尚未被人注意的方面，并总结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二、元和诗歌在诗史上的重要性及其整体特征

中唐，特别是中唐的元和时期，是唐代诗史乃至中国诗史上极堪注意的一个时期。清人叶燮有言：“迨至贞元、元和之间……后之称诗者胸无成识，不能有所发明，遂各因其时以差别，号之曰‘中唐’，又曰‘晚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

^① 关于近 20 年来文学接受史的研究状况，可参见陈文忠：《20 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9 期。

‘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①即视中唐之“中”为古今百代之“中”，为中国文化史、文学史最重要的转折点。近人陈衍进一步提出诗史“三元”之说：“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②沈曾植亦有“三关”之论：“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③这里，无论是“三关”，还是“三元”，元和均在其中，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元和”为唐宪宗的年号，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十五年（820），其实存仅有15年时间。但文学史上的“元和”，实际上应包括此前的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此后的长庆（唐穆宗年号，821—824）以及宝历（唐敬宗年号，825—826）、大和、开成（唐文宗年号，827—840）几个历史时段。这主要是因为，活跃在元和诗坛的主要作家大多经历了这几个时段：元和之前，孟郊、韩愈与白居易、元稹均于贞元年间登上诗坛，其所代表的两大流派已见雏形；张籍、王建则有了可观的创作，柳宗元、刘禹锡等亦在此一时段崭露头角。元和之后，韩愈于长庆四年谢世，元稹于大和五年谢世，张籍、王建约到文宗大和前期辞世，刘禹锡、白居易、贾岛则历经穆、敬、文三朝，直到武宗会昌年间才辞世。因而，要谈元和诗坛，不能不考虑与之前后相关联的几个时期，而要谈这几个时期，又不能不以这些著名诗人创作力最旺盛的元和一朝为代表。

元和与其前后的几个时期加起来，也不过短短五十余年时间，何以在文学史上如此重要，以致被认为是“古今百代之中”，是“三元”中极重要的一“元”呢？仔细寻绎，其与文化史、文学史等领域相关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择其要者，不外乎以下三点。

首先，元和为唐诗之第二高峰，亦为唐诗之大变期。综观唐代

① 叶燮：《百家唐诗序》，《己畦集》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二四四），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81~82页。

②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③ 沈曾植：《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引自《学术集林》第3卷所刊《沈曾植未刊遗文（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诗史，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诗人辈出，大家争雄，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高视阔步，各占胜场，合奏出激越昂扬的盛唐之音。开元、天宝之后，大历诗人难以接武，出现盛极而衰的落差。摆在元和诗人面前的道路无非两条：一是跟在盛唐这座诗歌高峰之后不越雷池，亦步亦趋；一是另出手眼，别觅新途。这两条路，前者平坦易行，但难以获取大的创建，难以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后者艰难崎岖，但却可获得创新的成就，可用深心大力彰显自家面目。这是一种两难的抉择，在这抉择中，元和诗人毅然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们发现，与其在盛唐诗人已深耕细作的熟地上再去用力，不如剑走偏锋，从其较少注意的方面突出奇兵，开疆拓域。于是，韩愈、孟郊等崇尚雄奇怪异之美，硬语盘空，戛戛独造；李贺、贾岛诸人或凄艳诡激，或幽寂清冷，均力辟新境；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则重写实，尚通俗，以家常语、眼前事入诗，重视诗歌的讽喻、教化功能，将杜甫已有展露的此一倾向推向极致。清人赵翼有言：“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①便准确指出了其各自的特点。叶燮论中唐诗亦谓：“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②更是高度肯定了韩愈大变唐诗的功绩。至于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由于长期处于荒远的贬地，远离社会政治中心，所以将全副精力用于对个体忧怨的抒发，对政敌的抨击和山水的写照，对志节理想的持守，用柳宗元的话说，就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从而展示出贬谪文学最集中最深刻的执著意识和悲剧精神。总而观之，竭力冲破盛唐诗创作范式的笼罩，在诗歌内容、形式、技巧诸方面求新求变，大力凸显自身特征，是元和诗人群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为后人重视的主要原因。

① 赵翼：《瓠北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3页。

② 叶燮：《原诗·内篇》（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其次，元和诗歌的部分新变已颇具宋调，开启了宋诗某些重要特征之先河。如所周知，创作题材的日常化、生活化，以及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等，是宋诗较突出的几个特点，而这几个特点，在元和几位大诗人笔下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韩愈将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山石》、《嗟哉董生行》以及《荐士》、《醉赠张秘书》等颇具散文化、议论化特点的作品。陈寅恪评其部分诗作为“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①。而在创作取材的日常化、生活化方面，韩愈也作了大量的努力，如其写落齿，写酣睡，写人情，写物理，将此前不能入诗的诸多生活物事纳入诗中，不厌其详，不厌其细，以致宋人欧阳修这样评论道：“退之笔力无施不可……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②与韩愈相比，白居易、元稹等人更以贴近生活而著称。白氏声言：其杂律诗多“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与元九书》）元稹也说：“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上令狐相公诗启》）明确表现出对世俗化、私人化、情感化的追求倾向。这样一些特点，被宋人拿去，发扬光大，遂成为宋诗的一些重要特点。而细究起来，元和一朝实为其不可忽视的主要发祥地。诚如钱钟书在辨析唐宋诗之分野时所说：“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③就此而言，要考察唐诗如何过渡到宋诗，宋诗从唐诗中吸取了哪些东西，元和诗歌实在是不能舍之绕行的一个重要驿站。

再次，元和诗人的内部交往颇为频繁，形成了较为明确、自觉

①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 欧阳修：《六一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6页。

③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的流派意识，从而使其创作特点获得了较个体诗人更为突出的集团放大效应。据我们考订，唐五代共有诗作者 3228 人，作品数 50454 首；在历时 300 余年的唐五代诗发展历程中，大致可分为七个诗人代群，就中以盛唐开天诗人群和中唐元和诗人群最为活跃；两大诗人群活跃着最著名的二十位诗人，即开天时代的张九龄、孟浩然、王昌龄、李颀、高适、王维、李白、崔颢、杜甫、岑参；元和时代的孟郊、张籍、王建、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贾岛、元稹、李贺；这些诗人仅创作量一项即不仅分别高达该时期的半数以上，而且其作品数之合（11661）已占全部唐诗（50454）的 23.11%。^①此外，我们又对两批诗人所作交往诗进行比较分析，知元和十大诗人现存诗为 7288 首，其交往诗共 3888 首，占现存诗作总量的 53.35%。这一比例，大致与开天诗人持平。而就其现存诗和交往诗的总量言，则比开天诗人分别增加了 2915 首和 1291 首，增长率分别为 66.66%、49.71%。^②此一情况说明，到了元和时期，诗人们的创作激情及其与他人交往的频率都大大提高了，诗歌传播接受的几率也大大增强了。也就是说，更重视人际交往并在客观上导致其诗作得到较广泛传播，成为这一诗人群的突出特点。

具体来说，在交往诗的赠与和接受的篇数上，白居易、刘禹锡、元稹三人均达百首以上，名列前茅，这说明他们有着频繁的外交流，是此一时期最为活跃的作者。张籍、韩愈、孟郊、贾岛所作交往诗多在 50 ~ 20 首之间，在创作量上难与白、元诸人争衡，故只能算是一般作者。至于柳宗元、王建、李贺三人，所作交往诗均在 20 首以内，创作数量很少，因而属于封闭型作者。当然，从他们交往的人次看，则以韩愈、张籍、刘禹锡三人最多，属于活跃交往者；白居易、元稹、贾岛、孟郊等而次之，属于一般交往者；

^① 尚永亮，张娟：《唐知名诗人之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2003 年第 6 期。

^② 尚永亮：《开天、元和两大诗人群交往诗创作及其变化的定量分析》，《江海学刊》，2005 年第 2 期。

柳宗元、李贺最少，属于封闭型交往者。由此已可清晰看出元和十大诗人中不同作者社交范围之广狭、人际关系之疏密、个人心性之开放与封闭等有关情况。进一步看，在人际往还与交往诗创作两个层面，元和十大诗人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即活跃作者在人际交往中往往范围不大，主要是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几位友朋往来甚密；而一般作者的人际交往则范围较广，与群体内的多数人均有联系。至于封闭型作者的交往诗创作，则与其人际往还成正比，均呈低落态势。据此，似可得出对元和诗人群内部交往方面的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社交面不广而交往诗创作量较大的作者，更注重固定友人间关系的深化和发展，更具有有一种基于相同审美追求的派系意识，也更注重生活情趣的投合与诗美类型的互补。如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即属此类情况。在白居易所作与群体成员往还的 316 首诗中，有 172 首是写给元稹的，120 首是写给刘禹锡的，二者相加，已占其群体内交往诗总数的 92.41%。与此相类，在元稹、刘禹锡所作与群体内成员往还的 114、158 首交往诗中，各有 106、115 首是写给白居易的，分别占其此类诗作总量的 92.98%、72.78%。可见，无论元与白还是刘与白，均具有极密切的关系，所不同者，元白交往主要在白生活的前期、中期，而刘白交往则已到了白生活的后期；元白关系更多地集中在共同的诗学理念和诗派追求上，刘白关系则重在二人晚年生活方式的类同和相异诗美类型的互补上。他们或长篇唱和，或短韵酬赠，形成了当时诗坛的独特景观，文学史上艳称的“元白”、“刘白”，正与此一情况相吻合。

第二，具有一定交往诗创作量而社交面亦广的作者，往往更具开放性与亲和力，更具领导诗坛的气魄或沟通派别关系的能力。如韩愈与张籍，其交往诗虽分别仅有 48、53 首，但却均与群体内七人主动往还赠诗，而其被动交往人数和受诗量则分别达到 9、7 人，53、61 首。在群体内部，韩愈与孟、张、白、元、刘、贾、王、柳、李等人，张籍与白、王、刘、贾、韩、孟、王等人，均有交往之作，就中韩愈与孟郊、张籍交往诗最多，分别达到 21、19 首；张籍与白居易、王建交往诗各 14 首，与刘禹锡、韩愈亦各达 9 首